

泰州学派

杨天石 著

泰州学派

杨天石著

中华书局

1980年·北京

泰州学派

杨天石著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5⁵/₁₆，印张·89千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900册

统一书号：2018·167 定价：0.45元

目 录

第一章 “天坠”之梦说明了什么	1
第二章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	6
第一节 生平	6
第二节 “大人”创造世界的“淮南格物”论	14
一、宇宙在我,万化生身	15
二、立吾身以为天下国家之本	20
第三节 彻底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27
一、天然自有,不费些子气力	28
二、心之本体,着不得纤毫意思	32
三、乐向心中寻	41
第四节 貌似进步的命题——“百姓日用是道”	46
一、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	47
二、逻辑上的“无类比附”	51
三、百姓日用而不知	57
四、存在着“认欲为理”的可能	63
第五节 鼓吹封建道德的“性能易命”说	68
第三章 王骥及其弟子韩贞	78
第一节 王骥“自然之谓道”的哲学思想	78
第二节 被毒害了的奴隶韩贞	89

第四章 被视为“鱼馁肉烂”的颜钧、何心隐思想	103
第一节 颜钧、罗汝芳的“制欲非体仁”论	103
第二节 何心隐思想剖析	124
一、无有不亲，无有不尊	127
二、聚和合族	134
三、无欲、寡欲与育欲	137
四、易天而不革天	143
第五章 耿定向对于李贽思想的反扑	151
结束语	171
后记	176

第一章 “天坠”之梦说明了什么

在泰州学派的弟子中流传过一个故事，说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二十九岁的时候做过一个梦：天掉下来了，万人奔走呼号，于是王艮奋臂托天而起，看见日、月、星辰都乱了次序，便一一整理复原，万人欢舞拜谢。王艮是否确实做过这样一个梦，我们不必过于认真，不过，泰州学派弟子们之所以乐于传播这个故事倒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泰州学派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这一学派的政治目的。

泰州学派是活动于十六世纪初叶到这一世纪末叶的一个哲学流派。明代中叶以后，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风靡一时，弟子遍全国，有所谓浙中、南中、楚中、北方、粤闽等六大系，在此之外，有一派是南直隶（今江苏）泰州人王艮创立的，在哲学史上被称为泰州学派。

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没落时期，在它的机体内部正缓慢地生长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萌芽。明王朝危机重重，在几度挣扎之后，

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垂暮之年。

一五一一年（正德六年），即故事中的王艮“梦天坠”的那个年头，发端于河北平原上的刘六、刘七的农民起义部队正纵横驰骋于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并曾数度打到北京附近。武宗朱厚照在惊惶震动之际，东拼西凑，调集了京营的军队，调来了边兵，才勉强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历史的发展证明，反动派的屠刀可以奏效于一时，但是，不能彻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刘六、刘七起义之后，明代社会的各种矛盾继续向前发展。在城市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情况下，封建地主阶级对财富、金钱的贪欲强烈地滋长膨胀，对人民的剥削和掠夺日益加强。一五五一年（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在南畿、浙江等地区增收赋税，叫作“加派”。一五五七年（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收役银，取名“提编”。一五九六年（万历二十四年）以后，更派出大批宦官任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大肆掠夺民间的金银。

与此同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之风有增无减。世宗朱厚熜时统计，诸王、勋戚的贵族庄田已达二十余万顷，占官府有籍耕地的二十分之一。景恭王朱载堉侵占湖广土地四万顷。权臣严嵩仅在北京附近就

有庄田一百五十余所，南京、扬州等地又有良田、美宅数十所。穆宗朱载堉时期，南直隶有的地主占田多达七万顷。

这一时期，明王朝的政治已陷入瘫痪崩溃状态。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堉、神宗朱翊钧等几个皇帝都多年不上朝。官僚们倾轧排挤，联朋结党，贪污成风，道德败坏。严嵩的儿子是侍郎，孙子是锦衣中书，宾客满朝，姻戚都是大官，干儿义子多至三十余辈。倒台时抄没家产，发现历年所受贿赂竟有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吏部因送贿的人太多，用抽签法决定官吏的选任。军事上，边防空虚，北有蒙古俺达汗侵扰，南有倭寇肆虐。财政上，也已经山穷水尽。朱厚熜时期，国库存银不足十万两，财政赤字高达一百四十余万两之多。朱厚熜迷信道教，天天在西苑和道士鬼混，道士满京城。为了供皇帝斋醮，宫中年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为了供皇帝观赏，光禄寺养鹰、犬、虫、鸟等，年用肉一万六千多斤，用米五千二百多石。西苑养豹一只，用夫役二百四十人，年用粮二千八百余石；而在福建，人民生活无着，卖儿卖女，所得不过数斗！山西有些地方，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名叫“人市”！

这是一个人民不能按老样子生活，地主阶级也不

能按老样子继续统治的时代。

江西农民起义，乌蒙、芒部彝人、汉人起义，贵州苗民起义，广西、山东矿工起义，晋南农民起义，山东农民起义，琼州黎族起义，河南农民起义，四川农民起义，广东东部农民起义，海上起义，蕲州农民起义……各族人民的起义烽火在全国燃烧着。

神宗朱翊钧时的宰相，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张居正说过：

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答西夏直指耿楚侗》，《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五》）

又说：

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此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答福建巡抚耿楚侗》，《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二》）

公元二世纪的黄巾军，摧毁了近二百年的东汉王朝的统治。九世纪的黄巢大起义，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唐王朝地主阶级专政。十六世纪，造反的农民们又已经“十百为群”地发展到明王朝的“京师十里之外”了，这就不能不使地主阶级中某些敏感分子意识到“末世”的即将来临。

存在决定意识，泰州学派中流传的王艮梦“天坠”这一故事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

“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这是写在刘六、刘七起义军中两面大旗上的口号。它说明了农民们决心砸碎明王朝的统治，建立他们自己想望的社会。

“奋臂托天”，“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年谱》，《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挽救摇摇欲坠的明王朝的封建统治，调整已经进入末期的淆乱了的封建社会的秩序，使之复原“如故”，这就是王艮及其弟子们的政治目的。

这是一条和农民起义军完全对立的路线。

第二章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

第一节 生平

王艮(1483——1541),原名王银,字汝止,泰州安丰场(今东台安丰)人。安丰产盐,王艮的父亲就是煮盐的灶丁。王艮七岁入学,十一岁的时候,因家贫不能继续读书,也参加煮盐劳动,所以曾被称为“亭子”。“亭子”,就是灶丁的意思。十九岁以后,王艮曾几次去山东从事商贩活动,“经理财用,人多异其措置得宜,人莫能及,自是家道日裕”(《年谱》),经济地位逐渐改变。二十五岁时在山东“瞻拜”了孔庙及颜渊、曾参、子思、孟子诸庙,“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同上)。回安丰后,每天诵读《孝经》、《论语》、《大学》等儒家著作,还把书放在袖子里,逢人质义。二十七岁时,开始闭门静思,默坐体道,决心做“圣贤”。这样夜以继日、不分寒暑地想了几年,到二十九岁,据说,在做“天坠”之梦的当夜,一觉醒来,浑身大汗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可已”(同上)。这就是说,已经形成

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以后，王艮讲说经书就常根据自己的心得，而不拘泥于旧注了。三十二岁时，王艮在当地已经很有影响，“各场官民遇难处事皆就质于先生，先生为之经画”（同上），与地方官吏、士绅往来日益频繁。

三十七岁时，王艮开始传道。他首先按古代《礼记》等书的记载做了一套冠服：帽子叫“五常冠”，取仁、义、礼、智、信之义；衣服叫“深衣”，是一种古代的连衣裙。穿戴起来之后，便捧着笏板，“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并在门上大书：“此道贯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同上）

一五二〇年（正德十五年），王艮三十八岁，他从吉安籍塾师黄文刚那里了解到了王阳明所讲的“良知”之学，便远道去江西找王阳明。到南昌后，王艮穿上所制冠服，通过满街环观的人群来到王阳明的衙门，以“海滨生”的名义要求进见。守门人不理，王艮便赋诗二首：

孤陋愚蒙住海滨，依书践履自家新。谁
知日日加新力，不觉腔中浑是春。

闻得坤方布此春，告违艮地乞斯真。归
仁不惮三千里，立志惟希一等人。去取专心

循上帝，从违有命任诸君。磋磨第愧无胚朴，
请教空空一鄙民。

第一首自述求学经过：孤陋愚蒙，没有老师，只能依照书中所说道理摸索，日日努力，但是，却不懂得真理原来就在自己“腔中”。第二首为向王阳明求教之词，大意是：听说王阳明在江西讲学，所以不惮三千里之遥前来，目的是做“一等”圣人，希望王阳明指教他这个海边“鄙民”。王阳明见诗后，立即延入。二人之间有下面一场问答：

“你戴的是什么帽子？”

“有虞氏冠。”

“穿的是什么衣服？”

“老莱子服。”

“为什么穿这套服装呢？”

“表示对父母的孝心。”

“你的孝贯通昼夜吗？”

“是的。”

“如果你认为穿这套衣服就是孝，那末脱衣就寝时，你的孝就不能贯通昼夜了！”

“我的孝在心，哪里在衣服上呢？”

“既然不在衣服上，那何必把衣服穿得这么古怪呢？”

经过了这一问一答，王艮无言可对，表示：“敬受教！”^①

接着，二人又谈及天下事，王阳明还不大看得起这个海边“鄙民”，便说：“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思是，天下事不是你这样的人应该管的。

“我虽然是个草莽匹夫，但是，尧舜君民之心，没有一天忘记过。”王艮毫不示弱。

“当年舜住在深山中，与鹿豕木石共处，快乐得忘记了天下。”王阳明仍然劝王艮不要管自己不该管的事。

“那是因为尧这样的圣君在上呀！”

王艮的这句话打中了要害。明武宗是有名的昏君，当时也确实不是尧舜的盛世。经过了这一问一答，无言可对的变为王阳明。是啊！连“草莽匹夫”都来关心地主阶级的“治国、平天下”，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未尝不是好事，因此，王阳明表示同意王艮的看法。

就这样，反复辩难之后，王艮认为王阳明的学说“简易直截”，为自己所不及，便下拜称弟子；王阳明也很乐意于收这样一个门徒，于是为之改名，叫王艮，字汝止。

① 据杨起元《证学编》卷三，《王阳明年谱》所载与此小异。

一五二二年(嘉靖元年),为了广泛传布王阳明的学说,王艮自己设计并制造了一辆蒲轮车,上书“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等语,北行入京。途经山东时,正值爆发王堂所领导的矿工起义。起义军在莱芜、新泰、临城等地屡次打败明军,又沿黄河西岸进兵,直逼考城(今兰考),河南震动。王艮曾经为此见过德州州守,对他说:“州之民,皆赤子也,倘不忍赤子之迫于盗,何患无勇?”鼓励州守抗拒义军的进攻,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年谱》)。

在北京,由于王艮的衣、帽、车子都过于招摇,他讲的一套又和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不相合辙,因而,王艮的讲学活动受到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注意。“事迹显著,惊动庙廊”(《黄直莫文》,《心斋集》卷四),王阳明的在京弟子们把他的车子藏起来,衣服脱下来,劝他离京。回到绍兴后,王艮受到了王阳明的严厉对待,三日不见,王艮不得不长跪谢过。自此,便“欽圭角,就和坦”,留在王阳明的身边,“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年谱》)。有时,王阳明不亲见求学的人,就命王艮传授。

一五二五年(嘉靖四年),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在安徽广德建立复初书院,王艮应邀参与讲学,作《复初说》,鼓吹“学至圣人,只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同年,再次应邀至浙江孝丰讲学。次年,王阳明的另一个弟

子王臣任泰州知州，聘王艮至安定书院主讲。这时，王艮已经很有名气，林春、王栋等数十人前来求学。王艮将《系辞上传》和《论语》首章抄录在墙上。《系辞上传》首章有“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等语，《论语》首章为“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王艮抄录它们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讲学特点，鼓励弟子们热心向学。不久，写作了著名的《乐学歌》。

一五二七年（嘉靖六年），王阳明被派赴广西镇压瑶族、僮族人民起义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兵乱，王艮赶到绍兴送行。一五二九年初（嘉靖七年十一月），王阳明死于自广西北归的舟中，王艮又曾赶到浙江桐庐迎丧，并约集王阳明的弟子，为之经理家事。同年十二月，会葬王阳明，与同门弟子聚讲于阳明书院，并订盟。

王阳明死后，王艮的讲学活动更趋活跃。一五三〇年（嘉靖九年），与邹守益、欧阳德聚讲于南京鸡鸣寺。一五三四年（嘉靖十三年），与林大钦等聚讲于泰州。其间，四方向王艮求学的人也日渐增多，“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年谱》）。王艮的思想逐渐为其门徒掌握，开始形成学派了。

王艮的讲学活动得到封建统治集团中不少人的赞助。一五二九年（嘉靖八年），漕运总督刘节上疏，称颂

王艮“讲学励行，笃志前修，庶几海滨之善士，圣代之逸民”（《疏传合编》上）。一五三六年（嘉靖十五年），御史洪垣登门访问王艮，讨论“简易之道”。洪垣请王艮代拟《乡约》，作为一乡之人共同遵守的规矩。据说，交有司颁行后，“乡俗为之一变”（《年谱》）。事后，洪垣替王艮盖了几十间房子，供他讲学授徒之用，称为“东陶精舍”。次年，御史吴悌再次上疏，要求明朝最高统治者召用王艮，“致之阙下”，说是“于治道风教，必有裨益”（《疏传合编》）。

除讲学外，王艮这时还参预了当地“均分草荡”的一项活动。明制，自洪武初年起，即由国家拨付一定数量的“草荡”给灶户樵采，作为煎盐之用。有的地方每丁分得的“草荡”多者可达三十余亩，少者亦不下二十亩（《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生产出来的食盐则一律归国家掌握。后来，由于贫富分化或灶丁逃亡，原来按丁拨付的“草荡”逐渐被豪强或殷实灶户侵占。王艮的家乡也是如此，出现了“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年谱》）的状况。一五〇六年（正德元年），明朝政府曾下令清查灶丁原给滩荡：“见在者，给与领业；逃亡者，给增出空丁，或拨充人役，顶补原课”（《明会典》卷三十二）。也有部分官僚要求恢复明朝初年的制度，“奏请摊平”（《年谱》）。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很差，“几十年不决”（同上）。一五三